

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的制度阐释*

郑耀群

摘要：从产业集群理论演化过程来看，研究视角呈现出从关注区位、资源、技术等因素拓展到制度因素的研究趋向。制度是解释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变量。从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的视角，正式制度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显性调节机制，非正式制度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隐性调节机制，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路径依赖和制度锁定，导致制度与产业集群发展不兼容，进而制约产业集群的发展。浙江产业集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形成与产业集群发展相兼容的制度结构。

关键词：产业集群； 正式制度因素； 非正式制度因素； 制度锁定； 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 F062. 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2X (2017) —03—0190 (06)

作者：郑耀群，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71

产业集群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现象，撇开具体的国情、经济、社会和人文环境去研究产业集群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发达国家制度结构中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自我内生的，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容性，因此，交易效率的改进主要来自于技术创新层面的变化。而对于体制转型期的中国，交易效率的改进除了技术层面外，更重要地体现在制度层面。制度是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经济新常态下，探寻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古典时期、新古典时期和社会制度时期 3 个逻辑阶段。在古典经济区位理论框架下，关注的是单个企业的选址和产业地理分布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企业之间的关联状况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并开始关注产业集聚外生性的技术因素。新经济地理学强调规模收益递增和交通运输条件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启发，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新产业区理论开始研究社会网络、文化对企业相互关系的影响，引起了对产业集群的社会根植性和制度因素的研究趋向。

1. 影响产业集群的正式制度因素研究

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规范市场秩序等行为，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迈克尔·波特（1998）认为，政府最根本的角色是扮演信息提供者，政府有力的工具是提供高级生产要素。^[1]Rosenfeld（1997）认为，政府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应该是作为促进者和中间人，提供支撑性的基础设施，建立动态比较优势和有利于产业集聚化的制度，创造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消除创新体系的系统失效问题。^[2]Jinmin Wang&Paul Gooderham（2014）以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例，研究了地方政府在小商品市场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义乌政府在鼓励企业家精神，建立公平的商业竞争环境去融入全球化，纠正市场失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李颖（2011）认为，保持产业集群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建立起一套适合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化的制度环境，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的发展起规制、引导作用。^[4]乔彬等（2014）认为，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若缺乏制度创新，其“闭锁效应”就会显现。^[5]

除了地方政府行为之外，区域行业协会对产业集群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Shengjun Zhu&Canfei He（2015）将浙江宁波服装产业集群和永康五金产业集群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宁波行业协会是服装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具体包括在集

群企业获得土地，银行贷款，税收优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永康五金产业集群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动发展的。[6]阳毅、游达明（2012）认为，行业协会对产业集群的影响机制包括集群协调机制、创新激励机制、共负盈亏机制、组织保障机制 4 个方面。[7]

2. 影响产业集群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研究

对产业集群非正式制度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的关系研究方面。Robert Putnam（1993）首先关注集群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三意大利（意大利东北部）由于存在着丰富的社会资本而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8]Saxenian（1994）的研究揭示了非正式的社会联系对集群内知识流动和技术创新的影响，认为，美国硅谷的成功是由于区内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等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区域创新网络，而区内密切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人际交流对该网络的高效运行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9]H. M. NihalPadmasiri（2012）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斯里兰卡家具产业集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0]张杰，刘东认为，产业集群的主要优势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系型信任社会资本和劳动力的融合，提出从社会资本的演进路径角度推演集群的演进路径是现实有效的方法。[11]朱建民，史旭丹（2015）提出纵向、横向和斜向社会资本的 3 个维度，研究发现，基于产业集群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各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的创新绩效存在差异。[12]

综上所述，目前理论界从制度角度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已有的研究存在以下缺陷：一是从某一个制度层面去研究产业集群较多，从制度结构研究不多；二是关于制度对产业集群的正面效应研究较多，制度的负面效应研究较少。本文建立的产业集群制度分析框架体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坚持制度结构的理论立场与分析视角，从制度结构视角分析避免了单一制度视角的片面性，对产业集群进行全面的分析；二是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既分析制度因素对产业集群的正面效应，还分析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导致的制度锁定对产业集群的负面效应，进而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制度因素对产业集群的作用机理。

二、产业集群制度分析逻辑框架构建

1. 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制度因素界定 Douglass. C. North（1991）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这些规则是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以及它们的实施机制组成。[13]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地方政府行为和行业协会，因为两者规则的制定和实施都符合正式制度的特征，规则是人为制定的，而且是依赖组织等第三方来实施的，实施的环境条件包括法律、产权、权威等。非正式制度包括以信任、声誉、规范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企业家精神和区域文化。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地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非正式制度更多地表现为通过主体的内省和非正式的奖惩自我实施机制，是一种自发的协调和实施机制，实施的环境条件包括社会资本和行为人的相互依赖性。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结合产业集群的发展特征，选取的正式制度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因素是与产业集群发展关系比较密切的和重要的，由于论文篇幅所限，很难穷尽所有的制度因素（见表 1）。

表 1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制度因素

制度类型	规则形成方式	实施方式	实施机制	实施环境条件
正式制度： 地方政府行为 行业协会	人为建构	第三方治理	市场机制 权威机制	法律、产权、 权威等

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 企业家精神 区域文化	内生演化	自我执行	社会机制	社会资本、 相互依赖
-----------------------------	------	------	------	---------------

2. 理论逻辑框架的内容

本文的理论逻辑框架如图 1 所示,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制度因素包括正式制度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因素,正式制度是产业集群的显性协调机制,非正式制度是产业集群的隐性协调机制。制度通过影响集群内企业的行为进而影响集群的发展,本文更强调制度因素的协调和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制度促进了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合作,促进技术创新,提高产业集群的效率,进而促进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制度能否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取决于在其变迁过程中是否与产业集群的发展相兼容。

从动态、辩证的角度,本文不仅分析制度因素对产业集群的正面效应,还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动态地分析制度因素的负面效应。制度变迁是路径依赖的,由于自我强化机制,缺乏效率的制度轨道有可能形成并锁定。路径依赖是指制度框架使各种选择定型并约束可能被锁定的制度路径。路径依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诺斯路径依赖 I,指沿着既定的路径,政治制度和经济的变迁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这是一种正强化机制和良性循环的路径依赖;另一种是诺斯路径依赖 II,是指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后,初始制度的报酬递增消退,并开始阻碍生产活动,与此制度相关的既得利益者则尽力维护,从而使社会陷入制度的无效性,进入“锁定”状态,这是一种负强化机制和恶性的路径依赖。^[14]如果是良性的路径依赖,制度因素和产业集群是兼容的,则制度因素会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相反,如果是恶性的路径依赖,制度因素和产业集群不兼容,则制度因素会阻碍产业集群的发展,甚至会导致产业集群的衰退。因此,制度因素在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是动态变化的。产业集群的顺利成长和持续发展,与解决制度的稀缺问题以及持续的制度创新密切相关,需要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制度创新,形成与产业集群发展相兼容的制度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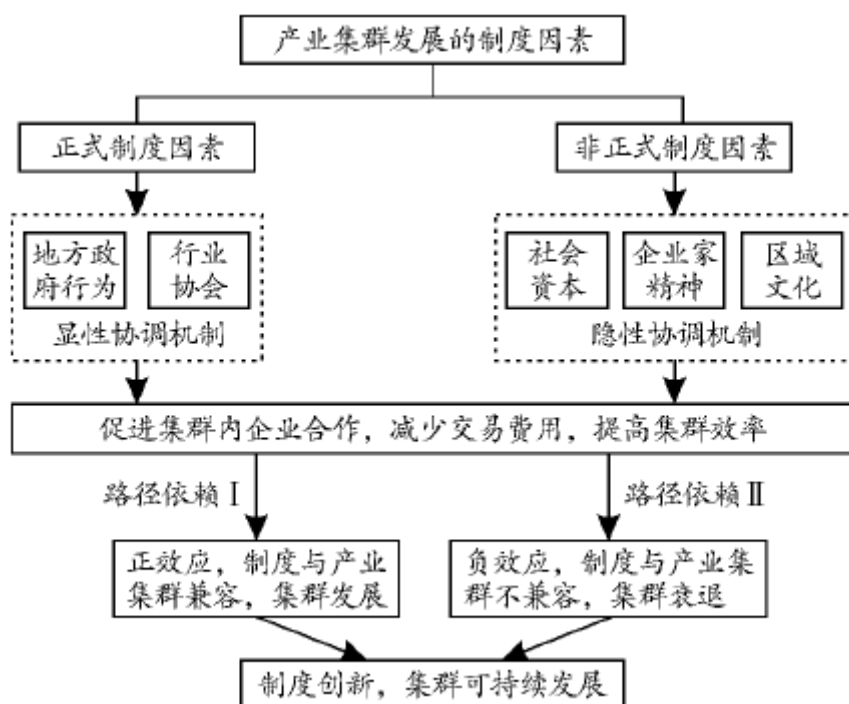


图 1 产业集群制度分析理论逻辑框架

三、影响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的制度因素

浙江省虽然没有良好的资源禀赋、没有良好的工业基础，也没有强有力的外商投资推动，但是浙江省以它独特的“块状经济”模式，创造了“浙江奇迹”。浙江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制度与产业互动的区域推动模式，制度是解释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变量。

1. 影响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的正式制度因素

(1) 开明、柔性的地方政府行为是浙江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推动力。浙江省各级地方政府在当地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柔性化、灵活性和开明性的特点，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供给。在产业集群的产生时期，当地政府都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有意识地默许和保护了产业集群，以及企业创始人的创新精神，激发了基层的活力，保护了民间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政府的角色也从“无为治理者”向“主动服务者”逐步转变。

浙江省地方政府对产业集群的支持政策包括，第一，适时制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引导和推动集群发展。浙江省政府为了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和转型升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见表 2）。第二，政府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公共服务体系和创新服务体系。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助推器。浙江省各地政府根据产业集群发展的特点，适时地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培训服务等公共服务。第三，积极维护市场秩序和品牌建设。同类企业集聚通常会造成过度的低价竞争、相互模仿，从而导致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区域形象大受损伤。浙江各级地方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着力于规范市场行为，引导并激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建立地方信誉。

(2) 行业协会是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组织保障。行业协会是一种经济制度，具有降低交易风险、减少交易成本、通过集体行动以培养成员诚实意识和克服成员机会主义行为促进合作的制度优势。目前浙江省行业协会总数是 3222 家，数量居全国领先地位。行业协会也充分体现了浙江块状经济的特色，基本覆盖了主要的产业集群，极大地促进了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

浙江行业协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行行业自律，及时反映行业呼声，维护会员共同利益和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二是加强企业间的联系与沟通，行业协会积极为企业间、行业间及地区间的相互交流与协作牵线搭桥，增强企业间的联系。三是为企业提供信息。绍兴纺织城、嵊州领带、永康五金等产业集群都已经建立了专业信息网站，专业网站一方面向会员及时通报行业信息，如市场需求信息、供给信息、国内外同行技术发展状况等；另一方面也是各个企业与外界交流信息的窗口，有很多企业都已经在网上承接订单。四是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如 2002 年温州烟具协会组织企业集体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并取得成功，维护了烟具行业的正当权益。

表 2 浙江省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内容
2003	《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提出了发展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的目标
2005	《金衢丽地区生产力布局与产业带发展规划》和《温台沿海产业带发展规划》，提出构筑新型产业体系，加快培育若干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使它们成为浙江建设世界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支撑

2006	《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围绕建设环杭州湾产业带、温台沿海产业带、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带，培育一批产业集聚区
2009	《关于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在全省确定了两批共42个产业集群示范区开展试点，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构建浙江特色现代产业体系
2015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建设特色小镇，使之成为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载体

2. 影响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因素

(1) 丰富的社会资本是浙江产业集群形成的社会基础

社会资本通过信任机制、声誉机制和集体惩罚机制有效地降低了集群内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浙江的社会资本是指由地缘、亲缘和血缘关系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个人是网络中的结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结使得交易活动得以进行，并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风险和交易成本。浙江产业集群是以亲戚朋友、邻里同学等关系为纽带，在“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村，一村带一乡”的模式下起步并快速发展起来的，形成能人示范与众人模仿的效应，并且在这个企业网络内存在着密切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

(2) 独特的区域文化和企业家精神是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深层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快速成长的深层原因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产业集群的成长是一个地域性和社会学的不断互动过程，由于区域文化的长期积淀，其自身形成的道德、风俗、习惯、价值观等，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产业集群内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以及集群的成长方向、结构与绩效。浙江的商品经济历史久远，活跃的商品经济孕育了浓郁的商业文化，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浙江人，形成了浙江独特的区域文化传统。而且浙江的区域文化是与市场经济高度契合的，这有利于形成微观主体的生产性努力激励和提高整个区域经济的交易效率。

在浙江产业集群成长过程中，企业家精神作为稀缺资源，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企业家通过改善自身企业的经营绩效、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从而扩大产业规模、树立集群品牌形象，更重要的是还对地方其他行为主体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15]这些优秀企业家是观念创新、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发动者与推动者，是家庭企业、专业市场的组织者和协调者，是产业集群创新活动最直接、最重要的示范者。

四、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路径依赖与制度锁定

浙江产业集群虽然发展迅速，但整体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大部分块状经济还存在明显的层次低、结构散、创新弱、品牌小的低端化锁定倾向，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轻工纺织和普通机械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优势产业相对较少，因此，出现了传统产业集群的“低端锁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高端不足”问题并存的局面。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三期叠加”的新形势下，正在消解的人口红利和资源优势、持续低迷的外需，让曾经一度辉煌的浙江“块状经济”不得不面对日渐消退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陷入了路径依赖与制度锁定，包括社会资本的锁定，认知锁定和政策锁定，会对产业集群的发展造成负面效应。第一，社会资本的锁定。以血缘、亲缘、地缘联系为纽带的排他性社会资本，在自我强化的同

时，会限制外部信息和技术资源的进入，以及产业集群内部更广泛的合作，导致集群被锁定在既有技术轨道，学习与创新能力下降，以前的成功模式反而会成为环境变化后的劣势。第二，存在认知锁定。很多企业的扩张方式都是依靠拼量、拼价格来实现的，主动创新意识薄弱，往往选择跟随和模仿，导致企业间产品同质化严重，陷入低成本、打价格战的恶性循环。第三，政策锁定。地方政府存在重视招商引资忽视产业链关联的短期行为，往往重项目招商、轻产业招商；重优惠政策、轻产业培植，缺乏对产业链的横向和纵向整合，出现只有“扎堆”而无“集群”的现象。同时，地方政府关键性、突破性和系统性政策不完善，导致核心要素和关键资源无法向产业集群集中。这些是浙江省产业集群升级的制度层面障碍。

五、浙江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建议

浙江经济的禀赋优势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过去的民营经济体制机制“灵、轻、小、集、加”的传统优势正逐步被企业大、资本富、创新强和互联网+的新型禀赋优势所替代，[16]对浙江传统产业集群形成冲击。因此，必须突破路径依赖与制度锁定，进行制度创新，实现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兼容与互补，促进集群转型升级，推动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

1. 地方政府需要在产业集群发展理念、思路和方法方面进行动态调整

通过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的转变，调整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推动产业集群升级。以制度建设为基础，政策引导作为补充，不断降低创业、创新的交易成本和要素融合成本，营造良好的竞争秩序和创新氛围，促进产业集群实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模式创新，形成新的市场竞争优势。第一，集群政策必须与环境相匹配。需要根据各区域独特的资源、制度人文环境来引导集群发展。尤其是目前浙江提出的“特色小镇”建设，一定要找准特色、凸显特色、放大特色，这是小镇建设的关键所在。发展最有基础、最有优势的特色产业，推进小镇特色产业差异化发展，不能出现“百镇一面”、同质竞争的问题。第二，集群发展要打破“行政分割”和“各自为战”的局面。跳出行政区划的限制和束缚，从区域的层面出发制定集群发展规划，根据市场导向和发展规律，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可按照区域“组群”式发展的思路，整合区域内的优势资源，实现优势资源的共享与合理的分工，不仅能优化集群产业链，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同质化、低层次竞争的问题。

2. 构建产业集群的创新平台和体系

地方政府应从全球化视野来把握产业发展规律，研究与现代产业集群相适应的各类要素支撑，研究探索各类块状经济的不同升级路径，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构建公共创新服务机构，促进产业创新网络的发展。探索推进多形式、多层次的公共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包括行业基础性或共性技术研发、行业技术与生产标准平台、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其他互联网经济平台、行业公共品牌扶持等，通过这些带有正外部效应的公共平台建设，促进产业集群升级。并建立跨区域创新体系，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实行服务平台的共建共享。

3. 加强行业协会对产业集群的治理能力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行业自律、市场开拓、信息引导、科技服务、中介协调等方面的优势，预测行业发展趋势，参与制定集群战略规划；创建区域品牌；营造创新环境，构建学习型区域；搭建服务平台，完善行业规制体系；冲破技术壁垒，应诉申诉反倾销等方面，为产业集群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4. 培育良好的信任合作文化，建立制度型信任

要促进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地构建和维护社会信任，培育良好的信任合作文化。关系型信任具有“家族化”和“封闭化”特征，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因此需要建立制度型信任。社会信任水平提高的制度路径应该以实现有利于市场交易行为重复博弈为目标。具体措施包括：第一，保护知识产权。这样有利于企业形成稳定的产权预期，发挥对市场交易行

为重复博弈机制的激励作用。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第二，建立有效的信息社会传递渠道。如组建行业协会、质量标准中心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等，对集群内企业进行公正客观的信誉评级，并向集群内外公布，对信誉良好的企业大力推介，对信誉差的企业则给予警示，以规范企业行为。第三，完善的法制环境。政府要加强监管，严厉惩罚欺诈行为，地方政府从制度上规范集群成员的博弈环境，用制度来防范“失信”行为以及危害集群整体利益的败德行为。

参考文献：

- [1] Porter M.E., .Clusters and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76) :77-90.
- [2]Jinminwang, Paul Gooderham,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The Case of Commodity Trading Markets[J].Environment and Planing C, 2014, 32 (03) :471-490.
- [3]Rosenfeld, StuartA.Bringing.Business Clusters into the Main-Strea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997, 5 (01) :3-23.
- [4]李颖.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因素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 2011, (02) :73-81.
- [5]乔彬, 吉琳, 胡子龙.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融合路径与质量——以中国 22 个典型产业集群为例[J].产业经济研究, 2014, (05) :44-53.
- [6]Shengjun Zhu, Canfei He.Global and Local Governance, Industrial and Geographical Dynamics:A Tale of Two Clusters[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2017, (34) :1453-1473.
- [7]阳毅, 游达明.产业集群创新中行业协会的构成体系与运行机制[J].经济地理, 2012, (05) :103-106.
- [8] Robert Putnam.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J].The American Prospect, 1993, (13) :16-23.
- [9]Saxenian.A.RegionalA dvantage:Culture and Compe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0]H.M.NihalP admasiri..The Role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Development of Wooden Furniture Clusters in Sri Lank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Issues, 2012, 11 (01) :19-36.
- [11]张杰, 刘东.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困境的一个制度解析——基于社会资本的逻辑视角[J].东南学术, 2006, (03) :98-104.
- [12]朱建民, 史旭丹.产业集群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视角[J].科学学研究, 2015, (03) :449-459.
- [13][14][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 陈郁, 罗华平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1.226, 127.
- [15]吕文栋, 朱华晟.浙江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基于企业家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 2005, (04) :86-93.

[16]金祥荣. 浙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优势和新格局[J]. 浙江经济, 2015, (24) :26-27.